

爱戏如命的 老两口

老两口

刘乃崇、蒋健兰夫妇及其戏曲评论

陈培仲

提

起爱戏如命的老两口，戏曲界的不少人都知道这是刘乃崇、蒋健兰夫妇的美称。这对贤伉俪数十年来看戏、谈戏、评戏，乐此不疲。近年，他俩将所写评论文章编成《老两口谈戏》。系列丛书，分三册出版。一本谈梆子及其他，一本谈川剧，均已面市。另一本谈京剧和昆曲，列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即将出版。这共计一百多万言的辉煌大作，在当今日趋冷落的戏曲评论领地上，树起了几座不朽的峰丘，连绵起伏，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无悔无怨的超级戏痴

今年已是八旬高龄的刘乃崇先生，出身于天津杨柳青的一家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即跟随大人们出入戏园。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饱览许多前辈名伶的演出。在上辅仁大学期间，对戏剧的爱好有增无减，曾一度从事业余话剧，同时开始发表戏曲评论文章。1948年他秘密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从此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戏剧生涯，先后在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参加戏曲剧目审定工作，参加《京剧丛刊》、《评剧丛刊》、《新戏曲》、《剧本》、《戏剧报》、《戏剧论丛》的编辑工作，曾任《人民戏剧》的编委、编辑部主任，直至1982年离休。

蒋健兰先生系江西九江人，同样是名门之后。她父亲蒋彝，旅居海外，为著名学者、诗人、画家，与张大千先生交往密切，是多年挚友。蒋健兰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剧本》月刊编辑、中学语言教师。1981年退休。

同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的这老两口，离退休之后，不但退而不休，反而更加忙碌。各地新戏新人到京，他们每戏必看，每看必评。他们风尘仆仆地赶赴全国不少地区参加戏剧活动，甚至不顾年高体弱，跟随剧团下乡，深入到最基层，目睹人山人海的露天演出，感受中国戏曲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他们对各剧种、各剧团、各演员、各流派，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爱护有加，称

的锦江饭店的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人帮”时期坐牢五年的政治犯，生于20世纪之始、终于20世纪之末、享年98岁的沧桑老人。这样的人物，电视剧演了几十集，犹见粗疏简陋，现在要在舞台上用两个来小时加以表现，确实太难了。但是，经不住李莎的再三恳求，也经不住董竹君这个人物的“诱惑”，徐棻终于答应了！可以说，李莎和徐棻都是在对自己进行一次严酷的挑战。徐棻显示了她一贯善于构思的匠心和腕力，她以董竹君逃出妓院与夏之时结婚到离婚的爱情心理变化为主线；以老年董竹君的回忆时空和青年董竹君的现行时空为正文，形成一种过去和现在相呼应、相交织的复线。这种双向流动与双方重叠的时空结构扩大了背景，深化了人物思维，在突出人物冲突的历史真实时，张扬了人物思想的现实意义。作者自己虽不很满意此剧，但应该说还是一部“平中见深、凡中出奇”的佳作。特别是它的结构：过去式与现在式构成的时空流动与重叠；老年董竹君与青年董竹君构成的情感交流，可以说是戏剧结构手法中一个新的创造。

万方数据

剧本“平中见深、凡中出奇”的特点，对李莎的表演又是另一层面的挑战。剧中没有了传奇情节、热闹场面、调味噱头、惊险技巧，这便要求演员发挥唱做真功，去表现人物细腻的情感、深藏的思绪和一贯的气质、精神。这对没有创造过大型现代戏曲的中心人物的李莎来说，确实也很吃力，但是李莎全力以赴认真刻苦地迎接挑战，跳出了她的“第三大跳”。

李莎在这个戏中的表现，有四点十分突出：其一、功底扎实，动作利落。这主要表现在她的身段台步；其二、表演细腻，心理充实。这主要表现在她对丈夫的那种又爱、又怨、又心疼、又期待、又无奈、又愤怒，以及在婆婆面前的忍让和坚决，在委曲求全中凄婉的笑容等等。尤其是那一次又一次说出“离婚”二字的不同语气和力度，都掌握得不愠不火，分寸适度；其三、扮相华丽，气质高雅。少女的娇羞中透出爽朗大气，夫人的高贵中充满温柔宽厚，委曲忍让中亮出坚毅自尊，真如牡丹般“天生不作寒酸相，错被人呼富贵花”；其四、噪音圆润，唱法清新。看过这戏

的观众，无不称赞李莎唱得特别地悦耳动听，行家们还指出她与别的川剧旦角发声不同。的确不同，她年少时学汉剧是师承老师的传统唱法，调到成都后她又到声乐老师刘崇义门下受教，后来又从著名歌唱演员李存琏学习，再后又自费到北京听金铁林教授上课。在长时间的学习、探索和在实践中不断地体会与提高中，她努力将自己传统的戏曲演唱方法与民族民间音乐的演唱方法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演唱川剧之路。在《都督夫人董竹君》中，李莎确实唱出了“音乐之声”。她的苦心，终结甜果。

总之，李莎就是这样在《都督夫人董竹君》中跳出了她表演艺术三级跳的第三跳。她的第三跳跳出了成熟、开拓、创新！亮出了她成为川剧大旦的潜力、资质、风采！

就《都督夫人董竹君》这个戏而言，也许因真人真事及人物身份与时代差异的局限，我以为还未能充分发挥李莎的全部才能和潜力，以后如有更适合她的剧本，我相信她将会跳得更远、更高、更美！

得上遍洒甘露的护花使者。这老两口离退休之后，心无旁义，笔耕不辍，看戏、评戏更成为他们生活之所需、生活之寄托。他俩心心相印、配合默契，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焕发出满天云霞，辉映着快被人遗忘的戏曲评论角落。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们不仅耗费毕生心血、精力，还要花费并不富裕的财力。诚如他们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现在发表文章难，出版书更难。《老两口谈戏》系列第一本《梆子及其他》面市近一年了，主要是送给新老朋友们，书店不卖，书摊更不屑一顾，这种书不挣钱。有人说我们傻，出书搭了心血还要自己掏腰包。但是我们痴心不改，钱怎么花不是个花。吃好一点，住好一点，享受一点固然不错，留下一点痴汉傻话在人间，也许有人看了，得到一点启示，哪怕是教训，岂不也好。一年来，我们又攒出一点钱，于是《老两口谈戏——川剧》又可以面市了，聊以自慰吧。”这段话，读之令人感慨心酸，更令人肃然起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这种“傻子”精神啊！“亦余生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从屈原开始，历代先贤圣哲为了心中理想，执著追求，九死不悔。从刘乃崇、蒋健兰两位超级戏痴身上，不也同样体现着这种精神吗？

功夫过硬的行家里手

戏曲评论是一门科学，要求从业者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扎实的学术功底，熟练的文字能力，而且要精通舞台艺术，熟悉戏曲规律，广交梨园朋友。最好还能粉墨登场，亲自体会“梨子”的滋味。北京大学教授、京剧研究家吴小如曾说：“搞文献资料的疏于理论，治戏曲文学的不大注意舞台实践即表演艺术，演员有实践经验都缺乏系统研究，专家学者有案头功底却不大了解活的戏曲演出史，能登台奏技的往往写不出文章，会写文章的又未必深知舞台幕后的底细。”可见具有全面条件的戏曲理论人才之难。而刘、蒋二位正具有全面功夫。他俩有正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识功底，有几十年看戏、谈戏的经历和积累，有与包括老、中、青三代众多戏曲艺术家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有大量戏曲史料和珍贵图片的独家库存，还有躬践排场的实践体会，……如此过硬功夫，实在罕有其匹。尽管他俩并未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也不会运用新潮的术语名词，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写的文章不能算是“理论”。但在我心目中，刘、蒋二位先生是学识广博、造诣深厚的戏曲史论家，是精通戏曲奥秘的行家里手。他俩所写的文章朴实无华，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是非爱憎分明，坚持实事求是。读罢《老两口谈戏》，有以下几点强烈感受：

一、真实可靠，堪称信史。对此，分别为两书作序的曲润海先生和戴德源先生早有明言。曲润海说：“乃崇、健兰先生谈戏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俩不像现在有些人不看戏就断然做结论。他俩只谈看过的戏，而且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发议论的。我十分惊奇他俩怎样收集到那么多那么老的照片，随手即可引入文中。”戴德源说：“如果把中国戏曲舞台譬作一本有着立体形象和伴以音乐的民族文化读物，那么，一页页地读下去，近几十年来，在读得多、读得透的‘读者’中，恐怕没有更多的人有过于刘、蒋贤伉俪了。”的确，刘、蒋二位所记所写皆亲历，文章不着一字空。加上他俩具有深厚的积淀和史家的眼光，因此往往史论结合、亦史亦论。例如在谈李桂云演出河北梆子《柜中缘》，筱舫演出的川剧《戏仪》中，不仅对两剧的来龙去脉、演变过程作了详细考证，而且对演员的加工、创造和精彩表演以及其他剧种的移植情况均作了如实评价，读了使人对该剧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一目了然。又如通过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的评点，介绍了“帅旦”这一新行当的诞生过程；

通过对金开芳、芙蓉花、喜彩莲、魏荣元、小白玉霜等众多评剧名家的评论，特别是通过总结中国评剧院十来年的艺术经验，几乎勾勒出评剧的形式和发展史。老两口所评论的众多剧种、剧目、剧团和演员，资料翔实可靠，立论平正公允，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是部当代戏曲史的必备读物和工具书。

二、准确细致，言之有物，不作空泛的议论，不讲套话。二位先生总是抓住评论对象的特点，突出其个性和风格，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乃崇先生就以《各有千秋》为题，通过许多实例，分析不同剧种在搬演同一剧目的不同特点，例如河北梆子名家贾桂兰演出《杜十娘》的“沉箱”这场戏，为了突出杜十娘悲愤的心情，“她站在船头，左手抓住李甲的襟领，右手抓住孙富的襟领，破口大骂，真是痛快淋漓。李甲、孙富两个坏蛋，护住自己的襟领，畏缩在两旁发抖。这一对比，更显得两个家伙的渺小。”这一夸张的表演手法，是河北梆子特有的，不同与京剧、川剧、评剧的处理，它们各有千秋，不能互相代替。再如河北梆子《坐窑》中，吕蒙正是个满身泥土气的北方农村的穷儒，完全不同于川剧《评雪辨踪》里那个又酸又迂的秀才。这些例子说明“各剧种应该努力挖掘、继承自己特有的优秀表演、歌唱技巧和表现人物的方法。但这并不等于拒绝吸收、学习兄弟剧种的技巧，问题在于学习吸收的过程中不要抹杀自己的风格特点。否则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原则，就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如今一些剧团争相邀请某些大导演、名导演，不顾剧种特点和剧团条件，搞大制作、大场面，把戏排得千篇一律，千戏一面，甚至搞不清楚什么剧种。我在观看一出轰动一时的黄梅戏时，就曾听见身旁的观众在议论：“这出戏有歌剧，有舞剧，有话剧，就是没有黄梅戏。”当然见仁见智，不必勉强。但重温《各有千秋》的观点，仍然十分有益。是真理，就不会过时。

我特别欣赏老两口对难于言传的戏曲演唱的精彩描绘，他们对不少名家的脍炙人口的演出，刻画如缕，历历如绘，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不禁悠然神往。常见的一些评论文章，只用诸如“表演细腻传神，演唱声情并茂”等套话，使人不得要领。而在刘、蒋二位高手笔下，自是神采飞扬，别有一番风光。你看，乃崇先生对川剧名旦胡漱芳在《打神告庙》中扮演敫桂英的出场描写：“……一开场，敫桂英即自远方走来，她喊一声‘王魁！贼呀！贼呀！’凄厉的声音，喊出了愤恨、绝望的心情。她头顶黄钱，手持信香，青衣甩发，上场来，两眼微微迷离着，赶步上前，两眼突然一睁，光芒四射。这个敫桂英不是懦弱的，无力的，相反，她强毅的性格在眼睛突然一睁中显露了出来。”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眼睛里像是喷出火来”的敫桂英，在三次打神中，不可遏止的愤怒、怨懑。作者由衷地赞扬道：“胡漱芳同志把敫桂英冲动的心情表演得十分激烈，像是一股江流，从高处冲下，一个回旋，再猛然‘砸’下来，然后一泻千里，在人们的心头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对于世态体会不深，对于人物理解不足，爱憎不够分明的演员，纵有很高的技术，也不可能演得如此激动人心。而演唱技术达不到高度的成就，也不可能把人物刻画得如此深刻，如此准确。”笔者有幸多次观看过胡漱芳的演出，深感乃崇先生的描写同样如此深刻，如此准确。难怪数十年之后，乃崇夫妇路过重庆，早已息影舞台、深居简出的胡漱芳特地前往拜访并设宴招待，表示对艺术知音的满怀感激之情。同时，在《王万梅演唱艺术的魅力》一文中，老两口对晋中晋剧团大青衣王万梅在《教子》、《芦花》等剧中的演唱艺术，缕析得精细入微，将“声情并茂”的含义诠释得有声有色，血肉丰满。即使没有看过演出的观众，读了两位先生的评论，也会被“唱足晋剧味，

演尽母子情”的魅力所倾倒，为王万梅的艺术所折服。毫不夸张地说，书中类似的描绘，俯拾即是。宛如高级厨师烹制的美味佳肴，品种花样繁多，让人品味不尽。

三、厚积薄发，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常常能收到举一返三之效。由于刘、蒋二位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头脑里储藏的剧目多、演员多、演艺多，因此在记叙、描写某一对象时，常常由此及彼，从比较学的角度，申发开去，使人获得更多的启迪。记得1958年秋，当时我还在四川大学读书，从创刊不久的《四川戏曲》上读到题为《抓住一点，细写人物》的文章，其中对川剧《御河桥》“三赶”的分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直未忘。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乃崇先生。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仍然感到它通过对几个剧目的相比较，研究传统剧目的一种表现手法——抓着一点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地方，一再地写，重复地写，发展变化地写，认为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新创作的借鉴。这一看法是从实践中来而又反过来影响实践的。剧作家魏明伦曾谈到他在《四姑娘》一剧中借鉴《三击拳》而创作出扣人心弦的“三叩门”。他的实践与刘乃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再如前面提到河北梆子名家贾桂兰演出《杜十娘》“沉箱”时，左手抓住李甲，右手抓住孙富，骂完这个骂那个，痛快淋漓，十分强烈。而京剧名家荀慧生处理就不一样：“杜十娘一见孙富，恨不得马上冲过去一把抓住孙富，都因两船相隔，没有跳过去，一脚蹬在船帮上，船一歪，人一晃，场面上有水声，便站住了脚，指着孙富骂起来。”荀先生说：“真要跳过去把孙富抓过来，看着很痛快，却破坏了表演的真实。”两种处理，各有特点，难分高下。乃崇先生认为：“除去对人物性格上理解有异，更因为剧种的风格不同。梅兰芳总是强调每一个剧种都有它的独特风格，可以吸收别的剧种的好东西，可是‘不要在吸取别人的东西的同时，丢了自己的传统风格’”。从一个细节处理入手，通过比较的方法，说明一条道理，一种规律。夹叙夹议、虚实结合，以小见大，使人领悟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二位先生戏曲评论的特点之一。这是那种见闻有限、就事论事的文章，难以企及的。

四、不虚美、不隐恶，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难；要一以贯之，更是难上加难。刘、蒋二位先生以正直知识分子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这条原则。不信，你看，写于四十多年前的《评秦腔〈游西湖〉的改编本》，对改编的成敗得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今天重温这篇尘封已久的文章，仍然感到其份量不轻。写于去年的《出人出戏走正路》一文中。他们引用著名导演李紫贵先生生前对上海演出的《宝莲灯》的看法：“他对我们说，把力气都费在机关布置、高科技上，把宝莲灯搞得满场飞，甚至飞到观众头顶上，十分炫奇，可惜没有写好、演好人物，把劲儿使歪了。”老两口显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尽管可能得罪一些人。再如《对群众负责的艺术家》一文，在赞扬杨兰春同志坚持为群众写戏，“把戏送到农村，真正做到了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同时，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好多人不这么搞，而是关起门来写，关起门来排，关起门来演，专搞些个汇演戏、调演戏。搞出来参加个什么节，闹俩奖就扔了。有人说，这是对上负责，就是不对群众负责，搞出戏来，不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群众有好戏看，而是为了应付上边，为了报账。其实，上边好应付些，只要内容好、思想好、政治好，就成功一半了。可是下边就难应付了，必须让他喜欢看，喜欢到愿意花钱买票才行。上边认为好，下边也认为好，才真是质量高。”这番针砭时弊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借用曲润海先生的话：“他们的急切

心情跃然纸上，他们不客气不避嫌的作风令人钦敬，他们的意见应该受到尊重和采纳。”在某些戏曲评论日益沦为变相说明书和廉价广告的今天，在真正的戏曲评论“缺席”、“失语”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刘、蒋这样具有真知灼见、敢于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啊！

为人作嫁的幕后英雄

刘乃崇先生大半生以编辑为业，蒋健兰先生当过编辑，也当过教师，其共同点都为甘为他人作嫁衣，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作为幕后英雄，两位先生曾为数以十计的戏曲艺术家记录整其经验，代笔为文。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乃崇先生帮助王瑶卿先生写成《我的戏剧生活》，帮助李紫贵先生写了《戏曲导演点滴体会》，都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作，分别在《新戏曲》、《戏剧报》上连载，引起很大反响。老两口离退休后，以更多的时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为李紫贵记录整理《忆江南》一书，为李笑非记录整理《川剧的好老板——李宗林》一书，编成《李紫贵戏曲表导演艺术论集》一书，写成《袁世海的艺术道路》一书，加起来近百万字。目前，他们又在为京剧艺术家、教育家谢锐青记录整理其艺术经验，年内可望出版。这种工作好汉子不愿干，孬汉子干不了，几乎已无人问津。但年逾古稀的老两口，仍然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地继续这一不可能缺的艺术建设工程。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争速度，他们还将艺术家本人请到家里，管吃管住，作竟日长谈。这种只知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老两口谈戏》系列，集中展示了他们对当代各剧种的众多艺术家的评论，特别是对梆子系统剧种、评剧、川剧等老中青几代演员的评论，如果将他们的名字列出，将占据很大篇幅，这里不多赘。需要指出的是，刘、蒋二位评论对象，除演员外，还包括剧作家（如杨兰春、胡小孩、墨遗萍、魏明伦、徐棻等），导演（如关士杰、李笑非等），管理家（如赵乙等），评论家（如陈国福等），可见其视野开阔，涉及戏曲这一综合艺术的各个部门。可以说，《老两口谈戏》是荟萃当代梨园俊彦的群芳谱，是聚集艺术珍奇的百宝箱。

与某些只记载艺术家身世的传记不同，也与某脱离实际、搬弄名家的深奥理论有别，老两口的文章，已如他们自己所说：“都是从实际中来的，记载了老艺术家、青年演员中在舞台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精彩的处理，一些内外结合的经验，一些体验生活的过程，可能能供人作些参考，或者年轻的朋友们可以从中感悟到些什么，吸取些什么。”从这自廉的告白中，也可见其艺术追求不同一般。事实上，他们所写的不少评论，如《王存才的活路》、《谈张庆奎的艺术经验》、《晋南的骄傲——记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赞北路梆子复兴发展的功臣们》、《丁、牛、郭、冀》、《评剧元老金开芳》、《浅探马金凤同志的艺术道路》、《忆彭海清老师谈艺》、《我们所认识的李笑非》等等，均将艺术家本人的艺术生涯、成就、特点以及其演剧见解、心得、经验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归纳和总结，是鲜活的戏曲理论和生动的艺术教材，不仅年轻的朋友，像我这样花甲之人从中也感悟、学习到许多东西，甚至会终身受益。

刘、蒋二位先生对描写对象都具有深厚的感情，诚为戴德源先生所说：“我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作者与川剧老一代的交情，对川剧中一代的热情，寄青年一代的关爱之情。总归一句话——对川剧艺术的钟爱深情！”对川剧如此，对其他剧种又何尝不是如此！例如老两口多次去山西，对山西的剧种、剧团、剧人非常熟悉，简直是如数家珍。山西的戏曲进京演出，老两口总是相扶相携，挤着公共汽车，提前赶往剧场。

场，热情地为之捧场。大家戏言他俩是山西戏曲剧团驻京的全权代表。他俩也洋溢着自豪之情，含笑默认。有着这样的感情基础，难怪他们的文章写得情真浓挚，文情并茂。例如在《郑奕奏说：“你真爱我！”》一文中，乃崇先生记录了他与有“福建梅兰芳”之称的郑老数十年间凝聚的友谊，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十年浩劫之后，郑老所有的剧照、资料荡然无存。刘老将自己珍藏的郑老早年的四张剧照拱手相送。“郑老珍重的接过剧照，激动万分，用颤巍巍的声音说了一句：‘你真爱我！’”刘老深情地写道：“一句话包含着多少真情。岁月一年年流逝，我们的友情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断地增进着。”其意殷殷，其情切切，感人至深。在《两进成都忆故人》一文中，乃崇先生记述与夫人蒋健兰1983年同游都江堰，想起故友李明璋创作的《望娘滩》、《夫妻桥》等剧取材于此地，触景生情，不禁流下怀念的热泪，写下动人诗章：“伏龙观里听望娘，玉垒山头祭二王。联袂夫妻桥上过。手抚铁索哭明璋。”次年，老两口应邀参加成都市艺术节，又专门去李明璋墓地凭吊，再次写了“故友衣冠可得寻，磨盘山上葬孤魂。……墓草青青沾我泪，心潮滚滚叹人琴。……”等肺腑之言，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文虽不长，却是感情浓烈，意境深远，如陈年佳酿，让人品味不尽。

老两口正是满怀炽热之情，著文写诗，为老一辈艺术家树碑立传，为中年骨干擂鼓助威，为后起之秀鸣锣开道。他俩是辛勤耕耘的园丁，慧眼识人的伯乐。有多少艺术家成长的道路上，都浸透着他两的心血和汗水。例如蒲剧青年艺术家任跟心、郭泽民在获得首届“梅花奖”之后，正值艺术兴盛之期，却因为种种原因，在长达十年之久没有新戏。蒋健兰先生对此困惑不解，愤愤不平，写出《我们就是要演戏！》，替青年演员喊出了心底的呼声。正如几十年前田汉先生的著名文章《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样，先生在文中仗义执言：“十几年没有新戏，时间就这么浪费过去了，可演员的青春有几个十年？民族的文化事业需要他们，观众需要他们，而他们则在虚度着春秋。不能再耽误了！他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演戏！’”对这篇文章的实际效果我没有调查，不敢妄言；但我知道后来任跟心、郭泽民的境遇有了改善，推出了现代戏《土炕上的女人》，在城乡演出均引起很大轰动，进京演出也好评如潮，任跟心因此而荣获二度梅。这当然是领导关怀和演职员们努力的成果，但老两口也功不可没。

老两口多才多艺，他们能诗词、擅书法、长摄影。他俩的诗词，多与戏曲有关，写得情采斐然、清新脱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诗词写成的当代戏曲史。在首都剧坛上，咏戏诗词写的最多的是李超先生，其次大概就要数老两口了，如今李超先生早已作古，刘、蒋二位先生，一位年届耄耋，一位年过古稀，今后恐怕后继无人了。因此，我想二位先生历来改写的咏戏诗词最好也能采结出版，不仅有史料和文学价值，对后学者来说，也有示范意义。乃崇先生还写得一手好篆字，常以自书两人的诗词赠人，诗、书双美，相得益彰，令人爱不释手，是极为高雅的纪念品。刘乃崇先生青年时代曾开过照像馆，是职业摄影师，为当时许多名伶，如程砚秋、荀慧生、金少山等人，留下了不少剧照，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他所摄、所藏戏曲演员剧照之丰富，别人很难比肩。对这笔宝贵财富，他俩从不私藏，而是大量提供给报刊，让广大读者欣赏到名家们的英姿倩影，风彩神韵。

老两口古道热肠、诚以待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有长者之风。我虽然接触不多，也深有体会。我对乃崇先生仰慕已久，曾拜读他的不少文章，但无缘识荆。粉碎“四人帮”

之后，在史若虚、任桂林两位院长的安排下，让我参与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的创办工作，并从教学岗位转向编辑岗位，与乃崇先生同行，常常一起看戏、座谈，逐渐熟悉。有多少次我见他两夫唱妇随，作精彩发言，并常在结束时展示他两书赠剧团或演员的诗幅，引起阵阵掌声，将会议推向高潮。我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6月，人民艺术家胡小凤率领河北省邯郸地区东风剧团二团进京演出《芙蓉女》等剧，在几日的座谈会上，首都数十位专家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胡小凤带病长年忙于演出，疲惫不堪，十分为之担忧。会议主持人赵寻当场宣布，剧团在京演出结束后，请胡小凤留京治病，经费由剧协和文化部设法解决。精通医道的蒋健兰先生主动提出，愿为胡小凤针灸，医治其失眠症。胡小凤德艺双馨的感人事迹和同行们的热情相助，使不少与会者热泪盈眶。这种动人的情景，至今难忘。其实，又何止胡小凤一人。如四川省川剧学校的学生组台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老两口不但以《希望在他们身上》为题，撰文加以热情鼓励，而且当其中的花脸演员李乔松等人突然嗓音失润，心急如火，蒋健兰得知，像对待亲人一样，为之治疗，使之很快康复。这群孩子从此都知道北京有位慈眉善目的“蒋婆婆”，不但文章写得好，医术也高明，更难得的是有一副救人急难的好心肠。

我本人受惠于二位先生之处不少。他俩是资深编辑，对我这位新手热情提携，给我厚爱。每当我向二位先生约稿，他们总是热情相助，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对于《戏曲艺术》中的某些错漏之处，二位先生总是及时提醒，帮助我们提高编辑质量。我和胡世均同志合作的《程砚秋》一书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插入多幅剧照，我又一次向二位先生求援，他们慷慨应允，立即取出珍藏多年，难得一见的程先生早年的几帧剧照，供我们选用，为该书增色不少。

1990年7月下旬，李紫贵教授表、导演艺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乃崇先生与李先生是多年挚友，对李的艺术研究有素，以《李紫贵同志艺术生平》为题，作了重点发言，使与会者深受教益。会后，他在家设宴招待专程来京参加研讨活动的川剧导演熊正堃、夏阳、李笑非，特地嘱我作陪。这是我第一次造访刘府，满院的花木和满屋的书香，立即让人感到一种浓浓的的艺术氛围。几位老友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或回忆往昔趣事，或评说今日剧坛，有意无意间都离不开一个“戏”字，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痴迷艺术的人生境界。使我这位叨陪末座的晚生后辈，如坐春风，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也享受精神上的“盛宴”。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两位先生书赠我的诗幅，调寄“如梦令”：

我有这般经历，君殚多年心血作嫁为他人，但愿满园春色。编辑，编辑，大展凌云之翼。

我深知，这是二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将它珍藏心底，作为座佑铭，时刻督促自己，不忘二老教诲。

近两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看戏不再享受免费优待，这是好事。但高昂的票价使得我们这些离退休人员望而却步，只好自动“戒戏”。因此很难与二位先生在剧场相见了，也很难听到他俩的精彩发言了，十分遗憾。不过，我仍然不时在报刊上读到他们的新作，继续受益，深感快慰。

爱戏如命的老两口是剧坛有口皆碑的、宽厚仁慈的大好人。好人一生平安，仁者寿。祝愿老两口平平安安，健康长寿！

最后，不嫌浅陋，以小诗一首，结束此文，表达我对刘、蒋二位老师的祝贺和敬仰之情：

爱戏如命老两口，躬耘剧坛忙不休。
才向梆子吐心曲，又为川剧放歌喉。
学养史识根底厚，文章诗词情浓稠。
甘为他人铺锦绣，煌煌大著耀高丘。